

當年入大學讀歷史系，老師們上課，開宗明義都要說歷史學是探索、發現歷史規律的科學之類的話，印象深刻。可是讀書稍多，卻沒見哪位著名史學家總結出了什麼規律。反不如如說的東西是可讀書稍多，覺得這才叫學術。今讀馬斗全新近出版的《南窗雜考》，感覺心有戚戚焉，三十年前的胡思亂想卻在此書中見了真章，會心之處，樂何如之！

當然，現在的想法比當初不能說有多少進步，但是畢竟複雜多了。關於考證，最盛時還屬清朝的考據學。梁啟超曾以清代考據學比之於歐洲的文藝復興，他給一個學者論述文藝復興的著作寫序，一下就寫了六萬字，和人家全書的字數差不多，後來只好出單行本，書名叫《清代學術概論》。書中有一個觀點說考據的方法是科學方法，陳義之最高，令人震驚。現在看，把好的東西都說成是科學的東西，挺幼稚的。然最初看到這說法時，卻有醍醐灌頂之感。考據確為學術研究方法之最重要的一種，這種觀念就在那時，逐步扎根在自己的頭腦裡。

考據的精義是「實事求是」，講究「無微不信」、「孤證不立」，最重證據，用證據說話，不尚空談，當然，考據學的證據都是書證，因此反對者斥之為「鑽故紙堆」。聯想到今日學風，抄襲、剽竊、造假已司空見慣。為了出成果不擇手段，浮躁之氣瀰漫學界。竊以之為，像馬斗全這樣做路路實實的考證文章，是醫治浮躁的對症之藥。多讀書的朋友都坐下來認真讀書，寫點兒自己的心得，拒斥炒作，抵制喧囂，也就不用人操心去建立什麼防止學術不端的機構了。

馬斗全的考證文章秉承清代學術傳統，一字一義，均能原原本本，查考最早的出處，辨析源流，得其指歸。這也是當然之事，理應如此，僅滿足於此，未見得有多少殊勝之處。馬斗全考證文章的獨特風格，是「咬定青山不放鬆」的那種勁頭，專針對習非成是的一些錯誤做考辨，甚至與時下挺受推崇的辭書較真。如《「東臯」釋義辨正》、《「東臯子」之「東臯一辨」》，前者從《爾雅》等古訓古註中溯源，指出「臯」無高地義，因而《辭源》、《辭海》等釋義均有誤，進而指出「東臯」語出阮籍，指歸隱躬耕之處，後人遂以之指代歸隱地，而非「田野或高地」的泛稱；後者則利用考證的結果，指出諸書之誤，說明自號「東臯子」的王績，其故里並沒有東臯之地，是因用典而以「東臯」稱其歸耕之地，別號正是表明其隱士身份的符號。似這樣言人所未言而又令人信服之新見，書中竟至數十個，於此可見此書之學術價值，亦可見考證於學術文化之重要。

一義之辨，孜孜矻矻，學人職志，自應如是。然而，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這樣的做法大可不必。講求典故、語詞的正誤，這類學者被稱為「記憶性文化族群」；對應的，則為「創造性文化族群」。「創造族」自是生氣勃勃的，做大事的，正面的；而「記憶族」則明顯是與抱殘守缺、故步自封、不求進取、保守落後類同，沒多大出息。「記憶族」的，他不但給錢鍾書、季羨林等老輩學者糾錯，還與《咬文嚼字》編輯部的編委反覆論難，欲辭此雅號必不得已也。我的派性是在「記憶族」這一邊，但苦於找不出什麼理由為這個族群來辯護，似乎悟出「真理的在「創造族」手裡。正是看第十二屆CCTV青年歌手大賽，懺然悟出「創造族」的所為未必全是對的，「記憶族」也正有自己存在的價值。這次大賽有余秋雨作綜合素質賞的評委，專門考察歌手的文化素養。但那些考察的內容，確然與「創造」無關，都是記憶性的東西。呵呵，原來大家都還得做「記憶族」，才能唱好歌或賽好別的什麼，「記憶」之於國民素質的重要性就不須贅言了。傳聞歌手大賽的收視率與余評委是否出鏡關係很大，說句時髦話，叫正相關關係，看不到秋雨評委，有些觀眾就換台了。由此又可見，余秋雨在公眾心目中，是學識廣博的形象，應屬「記憶族」。這真是悖謬，余氏本人素以「創造」而自負，對「記憶」是不屑一顧的。也正因為這個原因，余評委鬧出笑話後，不自知。馬斗全書中有《並非詩句》一則，說余秋雨「對『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作點評時，接連幾次說『這兩句詩』。……幸虧那位歌手也弄不清這兩句究竟是不是詩句，只好聽其教誨。她如果稍有常識，而給余秋雨評委糾正說這不是詩句，那就好玩了。」

文化仍需「記憶族」

趙瑞民



趙瑞民

如是我見

在昆明組成西南聯合大學。抗日戰爭勝利後的一九四六年，清華大學遷回清華園原址復校。

北京清華

新中國成立以後，經過一九五二年國家高等教育的院系調整，清華大學成為一所綜合性的工業大學，重點為國家培養工程技術人才。一九七八年以後，清華大學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新時期。一九八四年建立國內第一個研究生院，一九八五年建立國內第一個繼續教育學院，一九八八年建立建築學院，一九九三年建立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一九九四年建立信息科學技術學院，一九九六年建立機械工程學院。目前，北京清華大學設有理工學院、建築學院、土木水利學院、機械工程學院、信息科學技術學院、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經濟管理學院、法學院、美術學院、公共管理學院、應用技術學院、醫學院等十五個學院，共六十個系。累計培養畢業生十七萬人。

從清華大學走出了一批蜚聲中外的學術先驅、許多學科的開拓者與奠基人。國家表彰為「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二十三名科學家中，有十四名曾在清華學習和工作過；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中，有六位清華校友；中科院院士三百三十人、工程院院士一百一十四人在清華學習和工作過；還為各行各業輸送了一大批工程科技人才。二〇〇一年，清華學堂作為「清華大學早期建築」的一部分，進入國務院公布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

新竹清華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當局遷到台灣之後，於一九五五年在新竹市復校清華大學，復校之初首設原子科學研究所，一九六四年恢復大學部成為一所完備的大學。梅貽琦既擔任過北京清華大學的校長，也是新竹的清華大學的創校校長。新竹清華定位為研究型大學，是台灣地區最重要的四所大學之一（台、成、清、交）。該校設有理、工、原子科學、人文社會、生命科學、電機資訊及科技管理七個學院；共有十七個學系，十九個獨立研究所。學生數量大學部五千多人，研究所五千五百多人，佔地面積一百零五公頃。

目前，新竹清華已成為一人文社會、理、工、生科、管理領域均衡發展的學府。在台已造就英才超過六萬人，在國內外各行業均有優異表現，校友包括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中央研究院」院士十五人，產學研界領袖不可勝數。

兩岸清華攜手鑄品牌

隨著海峽兩岸人員往來的不斷加快，兩岸清華人的學術交流也不斷增加。二〇一〇年十月四日，台灣新竹清華大學校長陳力俊在北京與北京清華大學校長顧秉林簽署了兩項合作協議書，「攜手並肩，在國際上共同打造「清華」品牌，為建設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努力奮鬥」成為兩岸清華人的共同願景。

按照協議約定，兩岸清華將本着「友好合作、互惠互利、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原則，聯合建立兩岸清華大學聯合實驗室，在基礎科學研究、納米科技、生物科技、信息與網絡通訊技術、能源與環境科技，以及人文社會與管理等領域開展長期學術合作。

此外，根據兩校聯合培養雙碩士學位的相關協議，兩校每年將各推薦十名聯合培養碩士生，學生將通過在兩校學習分別獲得兩校學位。

明。著名京劇演員言慧珠，是梅蘭芳的得意弟子，早已享譽劇壇，自然毫無疑問的當選為「平劇皇后」。

「南派名旦」曹慧麟，則獲得「亞后」稱號。「歌星皇后」與「亞后」，分別為韓菁倩與張伊雯。管敏莉與顧麗華，則分別獲得「舞星皇后」與「亞后」的稱號。

這次「上海小姐」的評選，除了影劇、歌舞明星與所謂的「名媛」、「交際花」以外，還有很多女學生與一般青年女子參加，這對於提高婦女地位、鼓勵婦女參加社交活動，起了較好的作用。雖然，獲獎的「上海小姐」，多數都有較大的實力背景，依靠有人購買大量的選票獲勝。但是，這次活動所得的六千多萬票款，都用來救助災民，也算得是一件難得的善舉。

季旭東

能開展長途電話業務的郵局在那些年頭也是不多的，所以人們要想在郵局打長途電話，還得排長隊。到了節假日，這種情況更為嚴重，往往一個數分鐘的電話會耗去人們個把鐘頭甚至更長的時間。針對這種情況，郵局便規定每次並非是得超過的時限，例如五分鐘。打長途電話並非是要人們去死守着排隊，而是先排交上十元錢押金，然後便可

往事鉤沉

在營業廳內找地方休息或辨別的事，等着叫號就是了。打完電話後，去營業櫃台結算時以

百姓的電信記憶

早年間百姓們打市內電話主要依靠公用電話。那時市面上的公用電話也不多，一般都裝在位於顯眼路段的居民家裡，其安裝費用是由電話局買單的。打公用電話打進來找附近人家，就得由不計時。如果有電話打進來找附近人家，就得由打電話者先自報山門，說出其姓名與電話並告知守機者接聽人的姓名與住址；然後就由傳呼員按址找接聽人到公用電話處接聽或按號回撥。不過這樣一來就得付九分錢了；其中四分錢歸傳呼人

像的麻煩了。

如今，形形色色的選美活動，數不勝數，非常普遍。但過去，在比較封建保守的中國內地，卻對此視同洪水猛獸，橫加指責，無人問津。到了清末民初，雖然有些報刊，也曾舉辦過一些選美活動，但僅局限於妓女界。當時，權貴豪紳以此為樂，對一些入選的名妓，稱為「花界狀元」、「花界探花」及「花國總統」、「花國副總統」等。由於名聲不佳，一般的良家婦女，都不屑參與這類活動。直到一九四六年，因為募捐救災，需要籌集資金。在上海才開始舉辦了一場有別於以往形式的「上海小姐」選美比賽，讓全國民眾開了一次眼界。

舉辦過一些選美活動，但僅局限於妓女界。當時，權貴豪紳以此為樂，對一些入選的名妓，稱為「花界狀元」、「花界探花」及「花國總統」、「花國副總統」等。由於名聲不佳，一般的良家婦女，都不屑參與這類活動。直到一九四六年，因為募捐救災，需要籌集資金。在上海才開始舉辦了一場有別於以往形式的「上海小姐」選美比賽，讓全國民眾開了一次眼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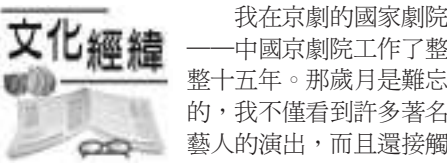
，即於十九世紀末被引進我國。但是由於近代的中國積貧積弱，因此在後來的近百年間，電話在我國的發展是非常緩慢的。電話最初登陸中國時被譯為「德律風」。那時有不少電話局以德律風總匯、德律風總辦署等為名。當然，那年頭沒有德律風者在人群中夢若晨星。就是到了數十年後的國民政府時期，我國的電信事業依然落後，即使是在當時的國都南京，百姓們也常常抱怨馬路不通，電燈不亮，電話不靈。所謂電話不靈，說的就是電話故障多，差錯多，就連一些政要的電話也不能倖免。據說在抗日戰爭的淞滬戰役期間，國民黨軍委會委員長蔣介石要給前方的顧長官（顧祝同……打電話，誰知竟被接到了朱長官（朱紹良）處，氣得蔣將軍罵娘……

新中國成立後，雖說我國的電信事業有了長足的發展，但直到改革開放後，才由於國力的增強，百姓們的逐漸富裕，方使得我國的電信事業發展到了今天這樣在世界上位列前茅的規模。

，即於十九世紀末被引進我國。但是由於近代的中國積貧積弱，因此在後來的近百年間，電話在我國的發展是非常緩慢的。電話最初登陸中國時被譯為「德律風」。那時有不少電話局以德律風總匯、德律風總辦署等為名。當然，那年頭沒有德律風者在人群中夢若晨星。就是到了數十年後的國民政府時期，我國的電信事業依然落後，即使是在當時的國都南京，百姓們也常常抱怨馬路不通，電燈不亮，電話不靈。所謂電話不靈，說的就是電話故障多，差錯多，就連一些政要的電話也不能倖免。據說在抗日戰爭的淞滬戰役期間，國民黨軍委會委員長蔣介石要給前方的顧長官（顧祝同……打電話，誰知竟被接到了朱長官（朱紹良）處，氣得蔣將軍罵娘……

新中國成立後，雖說我國的電信事業有了長足的發展，但直到改革開放後，才由於國力的增強，百姓們的逐漸富裕，方使得我國的電信事業發展到了今天這樣在世界上位列前茅的規模。

C4 大公園



文化經緯

劇院的資料室很有些書——表面上舊而破，但的確有價值。我和老藝人有過廣泛而深入的接觸，俗話說「演員的肚（子），雜貨舖」，真讓我大大開了眼。不僅讓我知道了若干失傳的戲，更讓我震驚的，是當年京劇盛興時和周圍京都文化水乳交融的關係。今天的中國京劇院，已由魏公村搬進了新樓，辦公練功的硬件都大大改善，演員也都變成了新人。我覺得，惟一的不足就是要問一下它今天的資料庫是否充足和豐厚，是否能適應今天的需求。

任何部門一搬家，老的資料自然就要丟失，這自然是很無奈的事。從更年輕的藝術家的需求說，那些塵土封鎖了圖書和文字，都屬於「既不好看也沒用處」了。事情果真是這樣的麼？我們丟失的東西已經太多，不能對傳統採取虛無主義。當然，在資料的收集手段上，我們可以利用當代的高科技成果，可以把線裝的古本書籍錄進薄薄的光盤，更應該對那些古老的敘述，採取「去粗取精」和「去偽存真」的整理。記得若干年前，中國京劇院準備了幾十個大大的紙袋子，計劃把建國以來新編的幾十齣戲，把每齣戲都成立一個檔案。包括劇本、音樂、舞台、演員自述，以及外界評論，全都收集進去。這樣做畢竟還是「向後看」，因為它不能保證未來百戰百勝。與中國京劇院同時，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把上演劇目都出了書，因此在前一階段，他們的藝術後勁就很大。

今天的國門早已打開，不時會有別的国家優秀的藝術品種進入視野。但是試問：我們究竟知道了多少？對諸多外來藝術的樣式，我們究竟掌握了多少？舉例說，中國京劇院是時常去日本的，試問歌舞伎是怎樣的一種藝術？京劇與它第一次的接觸，距今已經八十多年，如果今天還說「自己不了解」，恐怕是很難通過的。如果能對歌舞伎（以及西方的音樂劇）都有了深刻的理解，那麼無論排演新戲還是修改舊戲，我們的着眼點，就應該是比較確切和務實的了。

二〇〇一年，台灣的兩位著名京劇演員吳興國和魏海敏來到北京，進入中國京劇院教戲——是教他們十五年前所創排的一齣《慾望城國》。這是根據沙士比亞《馬克白》改編的，已創演了十五年，至今還不斷演出，並帶到了世界舞台上巡迴。這，就是他們的成績，同時也體現出他們的藝術眼光。你不能不承認，也不能不佩服。他們把戲教給了中國京劇院的年輕演員。論唱念技巧，當然是我們的演員強；論感受，是他們的更深也更真。這就是各自的情形。我們從中能夠得到什麼體會呢？我認為：它證明京劇除了我們習見的技術入口之外，還另有一條文化入口。台灣的京劇人口似乎更尊重沙士比亞，也更知道日本還有一位電影大導演黑澤明，他比台灣還早就改編沙士比亞的這一原著為日本的電影。因為台灣多了這一層關注，所以他們就多了一種入口。在我們這裡，梨園習慣還只有一個入口，是技術、技巧的入口。你要欣賞《四郎探母·坐宮》，北京老戲迷會告訴你戲中哪兒是關節，演員演好了給予掌聲，演不好則報以倒彩。在台灣，那裡通常另有一個文化入口。演出之前有準備，散戲之後會與演員漫談。這早被中國京劇院的演員所熟悉。我想，對此必須有所警懼。因為已經不是舊中國，世界風氣已經大變，如今WTO也已進入中國。如果今天落後一步，明天就會更加滯後。事實上，我們在接觸現代社會和現代藝術上的落後，已經不是用一兩天就能趕回來的。

京劇，已經在自發的盲目半盲目的狀態中，扭曲着行進了近兩百年。今天行進時所遇到的磕磕碰碰，就與從前的盲目半盲目不無關係。如何才能徹底剷除這種狀態呢？辦法只有一個，加強學習和總結，加強對資料的收集和研究。老的國故（如京城文化的種種）要研究，新的和外來的同樣也要正視。把兩個方面結合在一起，再根據自己正在進行中的實踐，最後集中成一項真正有效的決策——如果能夠遠見到這一點，相信我們的工作就會事半功倍地好起來。

這裡說的「國家劇院」只是個比喻，其實但凡是以冠以「國家」字頭的單位，就都帶有率先研究的義務。我「文革」中在農村呆過，那時全國上下都在演樣板戲，可我所在的那個縣，只要中央或省裡出了新戲，就派人提着大錄音機，進劇場那麼一錄，再讓老演員把舞台地位畫成「小人認」，回去「照貓畫虎」，肯定就「八九不離十」了。作為基層，它只有做做的任務，至於原創新戲的事，就別難為他們。所以，今天凡是冠有「國家」或「中央」字樣的單位，這種開創性的工作就不能不做。因此，為了更好更準地開創新的事業，後備的資料工作就絕對不能缺少了。

左右逢源李鴻章

茶茶苦

人與事

甲午戰爭失敗後，李鴻章因為喪權誤國，遭到滿朝文武和全國百姓的唾棄，為了起死回生，他採取了「韜晦」策略，以確保自己在政治激流中始終立於不敗之地。那就是四處逢迎，八方討好，暗中窺測權柄，時刻為自己考慮好退路，這種策略在維新變法中表現的是淋漓盡致。

他是洋務派中第一個公開提出變法主張的官員，也就是說他是支持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變法主張的。他認為維新勢力有市場，便捐銀二千兩，要求加入，因為甲午戰敗的臭名聲，被拒之門外。但他始終沒有與維新派絕交，在暗中仍舊給予支持。

隨著維新派與頑固派鬥爭的深入，他敏感地窺測到，權柄仍然在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的手中，因此，他就不再談變法了，而是公開站在了頑固派一邊。這樣，李鴻章在維新變法中，不論是頑固派還是維新派都對他沒有惡感。

一次慈禧太后與御前大臣議事，在談到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時，李鴻章說：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人士「皆書院經生，市井訟師之流，不足畏也」。當慈禧太后對外國保護康有為和梁啟超表示十分憤怒的時候，李鴻章又說：「外人不遵華情，誤以其土擬之，故容其駐足，然終當悉厥行藏，摒之且恐不及。」以此討好慈禧太后。慈禧見他不是維新派的同黨，又將他視為左膀右臂，任命他擔任兩廣總督，到康有為的家鄉鎮壓維新派勢力。

李鴻章到任後，除了對康有為的祖墳加以保護外，還逮捕了保皇會會員羅贊新等人的家人，通過外交途徑與外國駐華使節、香港總督等交涉，要其協助清政府逮捕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人士。這雖然是表面文章，但也使得慈禧太后對他更加放心。

在不同的人面前，李鴻章經常改換面孔。正因為李鴻章左右逢源，他才討得了維新派、慈禧太后對立雙方的歡心。慈禧太后也仍將李鴻章視為心腹之臣，委以重任，即使在義和團運動後李鴻章失勢，也沒有觸及到他的根本利益，李鴻章因此才得到善終。

如今，形形色色的選美活動，數不勝數，非常普遍。但過去，在比較封建保守的中國內地，卻對此視同洪水猛獸，橫加指責，無人問津。到了清末民初，雖然有些報刊，也曾舉辦過一些選美活動，但僅局限於妓女界。當時，權貴豪紳以此為樂，對一些入選的名妓，稱為「花界狀元」、「花界探花」及「花國總統」、「花國副總統」等。由於名聲不佳，一般的良家婦女，都不屑參與這類活動。直到一九四六年，因為募捐救災，需要籌集資金。在上海才開始舉辦了一場有別於以往形式的「上海小姐」選美比賽，讓全國民眾開了一次眼界。

舉辦過一些選美活動，但僅局限於妓女界。當時，權貴豪紳以此為樂，對一些入選的名妓，稱為「花界狀元」、「花界探花」及「花國總統」、「花國副總統」等。由於名聲不佳，一般的良家婦女，都不屑參與這類活動。直到一九四六年，因為募捐救災，需要籌集資金。在上海才開始舉辦了一場有別於以往形式的「上海小姐」選美比賽，讓全國民眾開了一次眼界。

，即於十九世紀末被引進我國。但是由於近代的中國積貧積弱，因此在後來的近百年間，電話在我國的發展是非常緩慢的。電話最初登陸中國時被譯為「德律風」。那時有不少電話局以德律風總匯、德律風總辦署等為名。當然，那年頭沒有德律風者在人群中夢若晨星。就是到了數十年後的國民政府時期，我國的電信事業依然落後，即使是在當時的國都南京，百姓們也常常抱怨馬路不通，電燈不亮，電話不靈。所謂電話不靈，說的就是電話故障多，差錯多，就連一些政要的電話也不能倖免。據說在抗日戰爭的淞滬戰役期間，國民黨軍委會委員長蔣介石要給前方的顧長官（顧祝同……打電話，誰知竟被接到了朱長官（朱紹良）處，氣得蔣將軍罵娘……

新中國成立後，雖說我國的電信事業有了長足的發展，但直到改革開放後，才由於國力的增強，百姓們的逐漸富裕，方使得我國的電信事業發展到了今天這樣在世界上位列前茅的規模。

文化什錦



文化什錦

舉辦過一些選美活動，但僅局限於妓女界。當時，權貴豪紳以此為樂，對一些入選的名妓，稱為「花界狀元」、「花界探花」及「花國總統」、「花國副總統」等。由於名聲不佳，一般的良家婦女，都不屑參與這類活動。直到一九四六年，因為募捐救災，需要籌集資金。在上海才開始舉辦了一場有別於以往形式的「上海小姐」選美比賽，讓全國民眾開了一次眼界。

，即於十九世紀末被引進我國。但是由於近代的中國積貧積弱，因此在後來的近百年間，電話在我國的發展是非常緩慢的。電話最初登陸中國時被譯為「德律風」。那時有不少電話局以德律風總匯、德律風總辦署等為名。當然，那年頭沒有德律風者在人群中夢若晨星。就是到了數十年後的國民政府時期，我國的電信事業依然落後，即使是在當時的國都南京，百姓們也常常抱怨馬路不通，電燈不亮，電話不靈。所謂電話不靈，說的就是電話故障多，差錯多，就連一些政要的電話也不能倖免。據說在抗日戰爭的淞滬戰役期間，國民黨軍委會委員長蔣介石要給前方的顧長官（顧祝同……打電話，誰知竟被接到了朱長官（朱紹良）處，氣得蔣將軍罵娘……

新中國成立後，雖說我國的電信事業有了長足的發展，但直到改革開放後，才由於國力的增強，百姓們的逐漸富裕，方使得我國的電信事業發展到了今天這樣在世界上位列前茅的規模。